

那样，探讨赋体的发展不能割裂辞与赋的血肉联系，把赋体的发展从它的文学环境中抽象出来，孤立起来。因此，如果不排斥辞与赋体发展的密切联系，从实体而不仅是从名称上来探讨赋体的发展，那么散文赋体出现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

综合上述这些分析，我认为即使从辞赋的发展过程来看，宋玉赋产生于战国末期也不是不可能的，而是完全可能的。因此，陆侃如等人关于赋体的发展经过荀子——贾谊——司马相如三个阶段的认识并不符合实际。据我所见，战国至西汉赋的发展大体情况是：由于楚地民歌的滋养，屈原创立了被后称为“楚辞”的新型文体。这种文体除了部分（如《九歌》）保留了诗的音乐性以外，大都（如《离骚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等）呈现出“不歌而诵”的赋的倾向。这些作品发展到荀子、宋玉时代，浸染于战国的纵横风气，更朝着韵散结合的方向发展，并主要从“不歌而诵”的意义上定名为赋，以区别于可以入乐的诗和专供阅读的散文。但由于当时作家所受南北方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同影响，赋这种文体出现了风格和形体都颇悬异的情况。荀卿赋的说理和所谓《诗经》式，正是他受北方儒家思想束缚和政治家气质的反映。汉初洛阳人贾谊赋“志胜才”的特点和运用不那么自如的《楚辞》式，也表现出他虽然倾慕屈原，向往楚文化，但仍带着长期受北方传统文化熏陶的明显形迹。而稍后于荀卿的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都是楚人，他们得南方地理和庄子、屈原等人之便，创立了散文赋体。汉兴以后，枚乘、司马相如等人又多是南方人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宋玉赋的影响，为了适应汉代“润色鸿业”的需要，巩固和发展了散文赋体，奠定了汉赋勃兴的基础。——这些已是题外之话，但对于辨明《文选》所收宋玉赋的真伪，却又是不能不加以说明的。

在黑暗中放射的《春光》

庄启东、陈君治编辑的《春光》，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由上海春光书店出版。庄、陈两位均是左联成员，他们决定办一个主要刊登左翼和进步作家的作品的文艺刊物，就由庄启东去找书店接洽出版。当时恰巧有个叫高鹏天的商人刚刚将曾出版过丁玲主编的《北斗》的湖风书店盘过来，改名为春光书店，这个老板急于要将湖风书店的存书全部推销出去，庄启东就投其所好，劝说他办个刊物，在刊物上可以大登书目广告，推销存书。这样，一本每期近二百页左右的大型文艺刊物终于送到了读者面前。

在第一卷一号中刊登的小说有何家槐的《铁路照会》，丘东平的《骡子》，宋之的《挤兑》，征农的《失去自由的人群》，李辉英的《福地》，杜衡的《换村小景》，还有魏金枝的剧本《宣誓就职》，艾青的诗《监房的夜》，鲁彦的散文，陈君治的论文。在这期上，郑伯奇写了《伟大的作品的要求》提出了“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，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个伟大的作品”的问题。在第一卷三号中，就郑伯奇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，在“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”栏目下共有郁达夫、艾思奇、夏征农等十五人写了应征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各种意见都有。在这期内，还刊登了任白戈、魏猛克的文艺座谈，沙汀、艾芜，蒋牧良、李辉英的小说，蒋本沂的剧本，庄启东、许幸之、艾青、柳倩的诗。

鲁迅对这份杂志也很关注并有好感。可惜的是这束从黑暗中放射了三个月的《春光》（共出三期）到五月一日以后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了，但它仍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依然使后人看到夺目的光采，它以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。（国靖）